*西方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史的方式是实力决定权利，公理只有在双方权力相等时才谈得上。因此强者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而弱者要受他们必须受的苦难。*

前文我们探讨了中国古代为何保持中央集权封建王朝轮番更替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从商周以后基本上就演化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社会，是各封建王朝周而复始地演绎。但为何西方能够走出封建社会而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西欧传统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纯粹私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国家、民族的概念。这样一种采邑制的社会形态主要由封主和封臣构成。封主给予庇护，而封臣就要接受封主强加的负担。封主在社会构建中处于决定地位，他们能够维持公共秩序、执行法律和处理各种公共事务。封建制的特点是分封、分散，因此导致社会陷入分割、政治上陷入分裂，王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断断续续的，换言之是软弱无力的。国王也只是一种大地主贵族，而当另外几个大贵族的实力总和超过了国王，而前者又愿意彼此联合，王权就岌岌可危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封建庄园中的大地主、贵族开始痴迷于享受、享乐，这引发了对金钱的持久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一些具有一技之长的农奴就被允许外出经营自己的特长。他们获得相当的自由，也需要缴纳金钱（代役租）给地主，即用钱解决自由身的问题。黑死病的流行更加激烈地加剧了以往的农奴制的解体，由手工业者和农奴为基础组成的市民阶级开始发展壮大，出现了城市。注意市民阶级是西欧社会以往不存在的阶级，因此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出现是原有封建体制之外的事情。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使得他们要寻求更充分的政治权利。由于市民阶级原有的组成成分，城市在一开始必然要受到封建主的干涉与束缚。这一阶段市民阶级所寻求的政治权利则围绕着寻求城市自治权而展开，有用金钱赎买、也有的用武装暴力夺取的。加之城市市民和国王在对付大贵族封建主时实际上是利益共同体，因此王权开始获得市民阶级的支持，得以与其他大贵族抗衡，于是产生了君主专制的现象。权力一极的加强就会导致相对上另一极的削弱。君主专制的发展——也就是世俗权力的发展——开始挑战教会的权力。1543年，英国通过《至尊法案》确定英王是英国最高的宗教领袖，这在政治上加强了王权；宣布教产还俗，经济上推动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例如英王亨利八世，他在同罗马教皇以及英国的两个外敌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斗争中越来越专制、越来越强有力。君主专制最大的功绩是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并以“国家至上”的原则指导民族经济，特别是推行重商主义，实质上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市民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我住在此地，就要管此地的事，因为这和我利害相关。” 因此当王权发展到无视民意时就要面临危险了。对于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市民们政治上的行为和责任心也就自然地发生，爱国是不待人教的。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发生、17世纪英国主权在王和主权在民的较量。“不是什么东西都归国王所有”，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在欧洲，当国王的总是强敌环伺，而中国皇帝的军权无人能比。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是它们向海外扩张的一股推动力量。经过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初步建立起了欧洲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秩序，现在的欧洲政治地图基本划定，“国家”成为欧洲的行政单位。霍布斯的《利维坦》认为，国家是人造的，而不是神造的。既然没有了统一的宗教，那么每个基督徒就应该把自己的国家当作自己“活的上帝”。

西欧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养成了强烈的爱国心，因此民族国家综合实力得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在老欧洲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宗主国将自己的剩余人口、贫困人口乃至于犯罪人群大规模转移出去，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掠为己有。这一过程缓解了人口与土地及资源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生俱来的社会转型压力，形成了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条件。西方发达国家得以顺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前提，本质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样一种短期的竞争过程中，欧洲逐步走出封建社会，向近代化迈进。